

保卫公共社会学*

作为对社会学的精神气质与我们所研究的世界之间日益呈现的罅隙的反应，公共社会学所面临的挑战是使得各种公众以多种方式参与进来。这些公共社会学不应该受到冷落，而应该将其纳入我们学科的框架之中。这样我们可以将公共社会学变成一项可见的、合法的事业，从而激活整个学科。因此，如果我们绘制出社会学的劳动分工，我们会发现在四种类型的知识中存在着对立性的相互依赖：专业的，批判的，政策的和公共的。

* 译自“*For Public Sociology*”，为美国社会学学会2004年度主席致辞。原文发表于*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5, VOL. 70 (February: 4-28)。无数无法得知其姓名的人对本文作出了贡献。作者感谢美国社会学协会办公室的萨利·赫尔斯曼(Sally Hillsman)、波比·西班牙特-洛斯(Bobbie Spalter-Roth)和卡拉·赫威利(Carla Howery)，他们在很多方面给予的帮助，如提供事实与数据，组织发言参与等。作者还要感谢芭芭拉·里斯曼(Barbara Risman)、唐托·马斯科维克-德威(Don Tomaskovic-Devey)以及他们的学生，还有查斯·卡米可(Chas Camic)和杰里·雅各布(Jerry Jacobs)对本文初稿的评论。这个演讲的现场版本可以从美国社会学学会的DVD中看到。译者单位均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两位译者的分工如下：胡丽娜(序言和论题一到六)，闻翔(论题七到十一)。

在最佳状态下，每一种社会学的繁荣都是整体学科繁荣的条件，但是它们也同样很容易成为病态的形式或者成为排斥和服从的牺牲品。这个权力领域召唤我们去探寻这四类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它们随不同的历史和国家而变化，并且它们为不同的个人职业生涯提供模板。最后，学科之间的比较指向了将社会学连向公共世界的脐带，强调了社会学在保卫市民社会中的特殊投入，后者自身受到了市场和国家的围攻。

这就是人们描述历史天使的方式。他的脸转向过去。在我们感知到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个单个的灾难。该灾难正将残骸不停地堆积起来，扔在他的脚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将已被粉碎的整合起来。但是，风暴从天堂里吹过来，淋湿了他的双翼；力量如此狂烈，以至于天使不能再合上双翼。风暴不可抵挡地驱使他去向他所背对的未来，而他面前的废墟堆正在向天空增长。这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

——瓦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瓦尔特·本雅明在纳粹军队逼近文明许诺的神圣避难所——他心爱的巴黎时写出了他历史哲学著名的第九论题。他将这个许诺用历史天使的悲剧性形象刻画出来，后者徒劳地与文明通过毁灭而进行的长征作斗争。1940年，对于本雅明，未来从来没有像从资本主义变成法西斯主义，同时从社会主义变成斯大林主义来蹂躏世界这么凄凉。今天，在21世纪的开端，虽然共产主义遭受挫折，而法西斯成为一种不易忘怀的记忆，残骸依然向天空

伸展。放任的资本主义引燃了市场专制和全球范围内的极大不平等，而复活的民主主义往往又成为权势利益、公民权剥夺、谎言和暴力的一块稀薄的面纱。历史的天使再一次被卷入风暴，这是一场从天堂刮来的恐怖主义风暴。

社会学在其初期渴望成为历史的天使，在现代性的残损碎片中寻找秩序，以解救进步的许诺。因此，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将社会主义作为异化的解救方法；埃米尔·涂尔干 (Emile Durkheim) 将有机团结从失范与利己主义中拯救出来；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尽管预示了“冰冷黑暗的极夜”，却依然在理性化中发现了自由，并且从祛魅中抽取意义。

在大西洋的此岸，杜波伊斯 (W. E. B. Du Bois) 倡导将泛非主义作为对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回应。而简尼·亚当斯 (Jane Addams) 则尝试从战争中寻找和平与国际主义。但是这时，进步的风暴侵袭了社会学的翅膀。如果我们的前辈去改变世界，那我们往往最终只能是保存它。为了在学术的阳光中取得一席之地，社会学发展出了自己的专业知识，无论是以罗伯特·默顿 (Robert Merton, 1949) 的才华横溢与博学的形式，塔尔科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的神秘宏大的设计，或者是彼特·布劳 (Peter Blau) 与奥蒂斯·达德利·邓肯 (Otis Dudley Duncan, 1967) 早期对分层与流动的绝顶统计分析。回顾20世纪50年代，西摩·马丁·李普赛特 (Seymour Martin Lipset) 与尼尔·斯梅尔塞 (Neil Smelser) 可以耀武扬威地宣称社会学的道德史前史终于结束，而迈向科学的道路全面敞开。孔德式观点吸引了社会学专业精英的注意并非第一次。在此之前，“纯科学”有着短暂的辉煌。一些年后，学校——尤其是社会学比较强的学校——被为争取言论自由、公民权利与和平的政治抗议点燃，控

诉民意社会学及其对科学不加批判的信奉。历史的天使再一次在风暴中展翅。

进步的辩证法主宰了我们个人的职业生涯与我们的整个学科。对于追求社会公正、经济平等、人权、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政治自由或者仅仅就是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最初激情，使得我们许多人投奔了社会学，而它现在却成为对学位证书的追求。进步成为一组学科技术——标准化的课程、正确的阅读书目、科层化的排位、密集的考试、文献回顾、剪裁得体的论文、被引用的出版物、优秀的简历、工作的寻求、任期档案，然后告诫我们的同事与后辈遵循同样的路线。尽管存在职业生涯的规范性压力，原生的道德动力却依然很少消失，社会学的精神并不会这么容易被熄灭。

虽然有局限，学科——在这个名词的个体与集体意义上——结出了它的果实。我们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建立专业知识，将常识转化为科学，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就绪去进行一个系统的反向转化，将知识回归到创造它的人之中，将私人问题上升为公共议题，从而再生社会学的道德本性。

为了理解公共社会学的产生、它的可能性与危险、它的潜力与矛盾、它的成功与失败，在过去的18个月中，我在美国40多个地区进行了讨论与辩论，从社区大学到国家组织再到精英部门——还有英国、加拿大、挪威、中国台湾、黎巴嫩和南非。对公共社会学的呼吁引起了我所到之处听众们的共鸣。辩论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公共社会学的研讨会，包括在《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 February, 2004)、《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 June, 2004)，以及《批判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 Summer, 2005)发表了一组文章。《脚注》(Footnotes)，美国社会学协会(ASA)的实事通讯发展了关于公共社会学的专栏，最终结果辑

结为《公共社会学之邀》出版(An Invitation to Public Sociology)(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2004)。社会学系组织了关于公共社会学的奖励与博客，美国社会学协会的网站以公共社会学作为主页，而社会学入门书籍也将公共社会学作为主题。社会学家在我们国家报纸的观点栏目上出现得更为经常。2004年，美国社会学的年会以公共社会学为主题，创造了最佳的与会记录。这些黑暗的时期将历史的天使从他的睡眠中唤醒。

我提出11个论题。它们以今天呼吁公共社会学的理由为始，继而到它们的多样性和它们与整个学科的关系——学科既被理解为劳动分工又被理解为权力的领域。我考察专业、政策、公共与批判社会学的矩阵，它们随不同的历史时期与国家而变化；然后将社会学与其他学科比较，最后讨论是什么使得社会学如此特别：它不仅是一门科学，还是一种道德与政治的力量。

论题一 剪刀差运动

对公共社会学的渴望越来越强烈，而其实现却越来越困难，因为社会学正在向左转而世界却在向右转。

我们应该将目前对公共社会学的呼吁归因于什么呢？它固然提醒了我们为什么很多人成为社会学家，但是公共社会学曾在某些时刻造访过我们，那它为什么又突然离去呢？

20世纪后半叶以来，社会学政治重心在向一个批判的方向移动，而其所研究的世界却在向相反的方向移动。因此，1968年，当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会员被要求为表明会员反对越南战争的决心投票时，在投票的人中，2/3的人反对美国社会学协会参与

其中。而在回答一个独立的观点问题时，54%的人表示他们个人反对战争（Rhoades, 1981: 60）——这个反战的比例与当时总体人口的反战比例是比较接近的。2003年，也就是35年后，在一个类似的反伊拉克战争决心的会员投票中，2/3的人表示赞成（Footnotes, July-August, 2003）。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应的民意调查中，75%的投票者表明他们反对战争（late May, 2003），而当时总体人口的75%是支持战争的。^①

在20世纪60年代的左倾趋势下，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除了在1968年波士顿年会上的骚动，包括马丁·尼古拉斯（Martin Nicolaus）著名的、对“权势社会学”（fat cat sociology）的无畏攻击，以及来自黑人社会学家、激进团体、女性社会学家的坦率要求，反对的声音仍然是少数。大部分会员都成长于早期的战后社会学，并吸收了其自由的保守主义。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主义在专业中扩散，尽管是以削弱的形式。女性与少数种族的出现和参与的增加，以及60年代的人在社会学系与我们协会中领导职位的增多，标明了—一个与社会学同步的批判性转向。^②

于是，政治社会学从研究美国选举民主的功效转移到研究国家及其与阶级的关系、作为政治过程的社会运动以及民主参与的

深化上。工作社会学从适应过程转向对支配和劳工运动的研究。分层从研究职业声望层级内的社会流动转向研究社会与经济不平等的结构变化——阶级、种族与性别。发展社会学遗弃了现代化理论，取而代之的是低度发展理论、世界体系分析以及国家主导的发展。种族理论从同化理论转向政治经济学再到对种族形成的研究。社会理论引入了更多对韦伯与涂而干的激进理解，并把马克思收录为经典。如果女性主义没能成为经典，它至少对大多数社会学的实质领域有着重要影响。全球化正给社会学的基本分析单元——民族国家——带来灾难，同时将我们的学科广义化。当然，也存在着一些反向运动——比如，移民研究中的同化论或者研究美国制度在世界扩散的新制度主义者都占统治地位——但是在20世纪后半叶，占主导地位的运动是朝着批判方向发展的。

如果政治性一代的延续与社会学的内容变化是剪刀的一边，那么向相反方向移动的另一边则是我们所研究的世界。即使平等与自由的花言巧语在强化，社会学家却记录下了不断加深的平等与统治。在过去的25年中，人们早期获得的经济安全与公民权利被市场的扩张（以及附带的平等）和强制性的国家取消，后者在国内外肆意侵犯权利。通常，市场与国家结盟反对人权往往被称作新自由主义。很自然的，社会学家变得更加敏感，将注意力放在更加负面的方面。但是他们收集到的证据表明，倒退在如此多的领域存在。当然，当我写作时，我们被一种精神上强烈反社会学的政体统治，它与“社会”的观念相敌对。

在我们自己的后院，大学受到了无数来自国家学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的攻击，它们认为大学收留了太多的自由主义者。同时，由于面临减少的预算，以及日益加剧的竞争，公共大学采取了市场方案来回应——与私人公司联合，

① 有关公众支持越南战争的数据来自穆勒（Mueller, 1973: Table 3.3），而有关公众支持伊拉克战争的数据来自盖洛普民意调查（Gallup Polls）。

② 1968年，美国社会学协会组委会的19个选举产生的会员都是白人男性，只有一个是女性，她是米拉·科马洛斯基（Mirra Komarovsky）。2004年，组委会的20个会员中正好是50%的女性和50%的少数民族。对于广泛的专业领域来说，1966~1969年之间，18.6%的社会学博士学位由女性获得，而2001年的这个数字是58.4%。种族的数字变化开始得较晚一些。1980年，14.4%的社会学博士学位由少数民族获得，而2001年这个数字是25.6%。

对学校进行宣传以吸引学生，讨好私人捐赠者，通过远程学习商品化教育，雇佣便宜的临时教员，更不用说大量的廉价服务工人了（Kirp, 2003; Bok, 2003）。市场方案是唯一的方案么？我们是否要遗弃大学作为“公共”事物（public good）的观念？对于公共社会学的兴趣，部分是对各种事物私有化的一种反应和反动。它的生命力取决于复兴“公共”的观念——另一个进步风暴的受害者。于是矛盾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社会学精神气质与我们所研究的世界之间的鸿沟激发了对公共社会学的需求，而同时也为其创造了许多障碍。我们应该如何继续？

论题二 公共社会学的多样性

公共社会学有很多种，它们反映了不同类型的公众以及接近它们的多种方式。传统与有机的公共社会学是相互补充的两极。公众既可以被毁灭也可以被创造。有一些永远不会消失——我们的学生是我们第一批入迷的公众。

公共社会学究竟应该意味着什么？公共社会学将社会学带入与公众的对话中，就好像人们自己参与谈话那样被理解。因此，它需要一个双向的交流。显著的候选者包括杜·波伊斯（Du Bois, 1903）的《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贡纳·麦都（Gunnar Myrdal, 1994）的《美国的困境》（*An American Dilemma*），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 1950）的《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以及罗伯特·贝拉等的（Robert Bellah et al., 1985）《心灵的习性》（*Habits of the Heart*）。这些书的共同之处在哪呢？它们都是由社会学家写的，它们都在学术

界之外被阅读，并且它们成为引起关于美国社会本质的公共讨论的载体——关于美国社会价值的本质、它的承诺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它的病症、它的趋势。我们可以将在我们国家报纸的观点栏目写作和评论具有公共重要性事务的社会学家称为传统公共社会学家（traditional public sociologists）。记者也可以将学术研究带入公共领域，如克利斯·尤根和杰夫·曼扎（Chris Uggen and Jeff Manza, 2002）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上发表的关于剥夺重罪人公民权的政治意义的文章；德瓦·佩杰（Devah Pager, 2002）关于种族如何加重犯罪记录对青年人就业前途影响的学位论文。在传统公共社会学中，被研究的公众往往是不可见的，他们微弱，因为他们没有产生内部的互动；他们被动，因为他们没有组建运动或组织，并且他们通常是主流。传统的公共社会学家能激起公众内部或公众之间的辩论，尽管他自身并不一定参与其中。

不过，还存在另一种公共社会学——有机公共社会学（organic public sociology），即社会学家与一个可见的、稠密的、活跃的、地方性的而且往往是对立的公众联系紧密。多数公共社会学是有机性的——社会学家与劳工运动、邻里协会、信仰团体、移民权利团体、人权组织等共同工作。在有机社会学家与公众间存在一种对话，一个相互教育的过程。对公共社会学的认知必须扩展到有机类型，它常常是不可见的、私人的，而且通常被看做是与我们的专业生活相分离的。公共社会学的事业就是要使不可见的变得可见，使私人的变为公共的，使这些有机的联系成为我们社会学生活的一部分。

传统的公共社会学与有机的公共社会学不是对立而是互补的，一种可以启发另一种。社会上最广泛的辩论，比如家庭价值，可

以通过我们与福利客户一起工作来启发和被启发。关于 NAFTA 的争论可以形塑社会学家与地方性工会的合作；与犯人一起维护他们的权利可以引发关于小型联合体的公共辩论。伯克利的研究生，格雷琴·波塞、艾米·斯查莱特和欧弗·雪伦（Purser, Gretchen, Amy Schalet, and Ofer Sharone, 2004）研究了校园内廉价服务工人的困境，将他们带出黑暗，并将他们构建为大学应该为之承担责任的公众。报告以更加广泛的关于贫困工人、移民工人以及大学的私有化和企业化为基础，并激发了对学术界作为一个有原则的公共体的公共讨论。在最佳情况下，传统公共社会学构建了有机公共社会学的框架，而后者规诫、界定和引导前者。

我们可以区分公共社会学家的不同类型并且谈论不同的公众，但是学术界与非学术界是如何加入对话的呢？为什么人们应该听我们的而不是从媒体获取其他消息呢？我们是否太具批判性而无法吸引我们公众的注意？阿兰·沃夫（Alan Wolfe, 1989）、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以及赛达·斯科奇波尔（Theda Skocpol, 2003）走得更远，并告诫我们公众正在消失——被市场毁灭，被媒体殖民化，被科层制侵袭。然而，公共社会学的大量存在表明公众并非缺失，只要我们用心去寻找他们。但关于如何使公众参与进来，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我们仍然处于我们事业的初级阶段。我们不应该将公众看做是固定的，而应该将他们看做是流动的。我们应该参与他们的创造和他们的转变。确实，作为社会学家，我们的一部分职责就是定义人的类型——艾滋病人、患乳腺癌的女性、同性恋——而且如果我们与他们合作完成这项工作，我们就创造了公众。女性范畴成为公众的基础——一个活跃的、稠密的、可见的、国家而非国际性的反公众——因为她们之中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学家将女性定义为边缘化

的、被排斥的、被压抑的、被消声的，也就是将她们定义为她们自己所认为的方式。从这个简单的题外话到多样的公众，很明显，公共社会学需要发展出一个公众的社会学——与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 1972 [1904]）、沃尔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n, 1922）、约翰·杜威（John Dewey, 1927）、汉娜·阿伦特（Hanna Arendt, 1958）、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91 [1962]）、理查德·森纳（Sennett, 1997）、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 1997），以及迈克尔·华纳（Michael Warner, 2002）等人一个体系并超越这个体系——来更好地理解公共社会学的可能性与缺陷。

除了创造其他公众，我们可以将我们自己也构建为一个在政治场域行动的公众。正如涂尔干著名地坚持专业协会应该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必要元素——而不仅仅只是为了维护他们自身狭隘的专业利益。因此，美国社会学协会可以而且确实已经对公共辩论作出了许多贡献，当它在密歇根肯定性行动一案（Michigan Affirmative Action Case）向最高法院呈递法官顾问的辩护状时，当它宣布社会学研究证明了种族歧视的存在并且种族歧视有其社会原因和后果时，当它的会员采取反对伊拉克战争和反对宪法修正案宣布同性婚姻不合法的决心时，或当美国社会学协会理事会抗议对埃及社会学家萨达·艾布拉赫（Saad Ibrahim）的监禁时。代表所有社会学家发言是困难和危险的。我们应该确信通过公开的对话，通过自由平等的参与，通过深化我们的内部民主来到达公共的位置。公共社会学的多样性不仅反映了不同的公众，也反映了社会学家不同的价值取向。公共社会学没有内在的规范性，除了投入围绕由社会学提出的问题的对话。它也能支持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就像支持解放社会学或者共产主义那样。如果社会

学实际上支持更多的自由主义或者批判的公共社会学，那将是社会学共同体精神气质进化的一种结果。

有一群不会在我们行动之前消失的公众——即我们的学生。我们每年创造大约 25000 名主修社会学的新本科生，如果把他们作为一个潜在的公众，那将意味着什么？它显然不意味着我们将他们作为空的容器向里面倾倒我们成熟的葡萄酒，也不是空白的石板让我们在上面雕刻我们深奥的知识。我们必须把他们看做是一个有着丰富生活经历的载体，使得他们对于将他们塑造为现在这样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自我了解。在我们强大的社会学传统帮助下，我们将他们的私人问题转化为公共议题。我们让他们的生活参与进来而不是将他们悬空，从他们的现状出发而不是从我们的现状出发。教育成为在我们培育的社会学领地上的一系列对话——我们自己和学生之间，在学生与他们自己的经历之间，在学生自身之间，以及学生与大学外的公众之间。“服务型学习”（Service learning）就是一个典型：当他们学习时，学生们成为面向更广阔的世界的社会学使者，正如他们将自己参与到多样的公众之中的经历带回到教室一样。^① 作为教师，我们都是潜在的公共社会学家。

通过认识到公共社会学的存在，从而使之合法化和有效化，并将它从私人领域带入公共领域来审视和分析它，是一件事情；而使得它成为我们学科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则是另一件事，这把我带到论题三。

^① 关于服务型学习有许多研究文献。与社会学有着密切关系的两本书的作者是奥斯特（Ostrow et al., 1999）以及马如罗与爱德华（Marullo and Edwards, 2000）。

论题三 社会学劳动的分工

公共社会学是一个较广阔的社会学劳动分工的部分，社会学劳动分工还包括政策社会学、专业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

传统公共社会学的拥护者，米尔斯（C. Wright Mills, 1959），以及他之后的许多其他人，都会将所有的社会学变成公共社会学。米尔斯回到 19 世纪晚期的先驱者那里，对于这些人而言，学术与道德是不可分割的。但在学术革命之前，转向早期这种状况并不存在。实际上，我们不得不继续向前，从我们真正所在之处出发，从社会学劳动的分工出发。

第一步是区别公共社会学与政策社会学。政策社会学是一种为某个目标服务的社会学，它的目标是由一个客户定义的。政策社会学的存在理由是提供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者来合法化我们已经达成的解决方案。一些客户通过一个精确的合同来规定社会学家的具体任务，而其他客户则更像定义更为广泛的政治日程的赞助人。作为一个专家见证人，比如，对社区的一项重要服务，是相对而言与客户较好定义的一种关系，而在国务院的赞助下去调查恐怖主义或贫困的原因则可能提供更为开阔的研究议程。

相反，公共社会学在社会学家与公众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其中双方的议程都被拿到桌面上来互相调适。在公共社会学中，讨论经常包括并非由双方自动共享的价值或者目标，因此互惠，或哈贝马斯（1984）称为的“沟通行动”，往往很难达成。尽管如此，公共社会学的目标仍然是发展出这样的对话。

芭芭拉·艾赫伦里奇 (Barbara Ehrenreich, 2002) 的畅销书《镍币与银币》(Nickel and Dimed)——一本关于低收入工作的民族志作品——指出, 在与其他对象的比较中, 沃尔玛 (WalMart) 的雇佣实践是公共社会学的一个例子, 而威廉·柏比 (William Bielby, 2003) 对同一家公司进行的关于性别歧视一案的专家证词, 则是政策社会学的一个例子。公共社会学和政策社会学的方法既不是相互排斥的, 更不是相互对立的。在某些情况下, 它们往往是互补的。政策社会学可以转变为公共社会学, 尤其是当政策失败时。比如当詹姆斯·科尔曼 (James Coleman) 的校车提案失败时, 或者当政府拒绝支持诸如威廉·朱利斯·威尔逊 (William Julius Wilson) 提出的创造工作以减轻种族化贫困的建议时, 或者保罗·斯达 (Paul Starr) 对克林顿执政期间医疗改革的介入失败时。同样, 公共社会学往往也能转变为政策社会学。基于黛安·沃恩 (Diane Vaughan, 2004) 以往对挑战者号灾难 (Challenger disaster) 的研究, 她与媒体合作对哥伦比亚航天飞机灾难 (Columbia Shuttle disaster) 的介入广为人知。这为她的观点被哥伦比亚意外事故调查委员会 (Columbia Accident Investigation Board, 2003) 在报告中采用, 尤其是对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 (National Aeronautical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组织文化的控诉铺设了道路。

如果没有专业社会学提供真实、可检验的方法, 积累的知识, 定向的问题以及概念框架, 就不可能存在政策社会学或者公共社会学。专业社会学不是政策和公共社会学的敌人, 而是它们存在的必要条件——为政策社会学与公共社会学提供合法性与专业基础。专业社会学首先,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它是由多样交叉的研究计划组成的, 每一个项目都有其自身的假设、范式、定义

的问题、概念构成以及发展的理论。^① 大多数子领域都包括发展完善的研究方向, 比如组织理论、分层、政治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种族社会学、经济社会学, 等等。子领域内也往往有研究方向, 比如组织理论中有组织生态学。研究项目通过解决它们定义的谜团向前发展, 无论是来自外部的失常 (预测与经验发现之间的不一致), 还是内部的矛盾。因此, 关于社会运动的研究是通过替代集体行为的“非理性主义” (irrationalist) 和心理学理论, 建立一个以资源动员概念为中心的新的分析框架来完成的。这个新框架继而导致一个政治过程模型的形成, 包括最近将情感包含进去的尝试。在每一个研究之内, 案例研究在解决一系列难题的同时又创造出新的难题, 将研究引向新的方向。当研究被失常和矛盾湮没, 或者当解决谜团的尝试变为一个保存脸面的方式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理论创新时, 研究就退化了。古德文和杰斯波 (Goodwin and Jasper, 2004: chap. 1) 认为, 这就是社会运动理论的命运, 当它变得过于一般化和内生时就退化了。

批判社会学, 我的第四个类型的社会学, 其角色就是来审视专业社会学研究的基础——清晰的和含蓄的、规范性的和描述性的。这使我们想起罗伯特·林德 (Robert Lynd, 1939), 他抱怨社会科学正在放弃它直面当代的、紧迫的文化与制度问题的责任, 而着迷于技术与专业化。米尔斯 (Mills, 1959) 指控 20 世纪 50 年代专业社会学的离题——转向深奥的“宏大理论”或者毫无意义的“抽象经验主义”, 后者使得资料与时代背景分离。

^① 在研究项目的观点之形成过程中, 我受到了埃默·拉卡托斯 (Imre Lakatos, 1978) 以及他与托马斯·库恩 (Thomas Kuhn)、卡尔·波普 (Karl Popper), 还有其他人辩论的重大影响。

埃尔文·古尔德纳 (Alvin Gouldner, 1970) 检验了结构功能主义关于共识社会 (consensus society) 的假设领域, 共识社会与 20 世纪 60 年代不断升级的冲突是背道而驰的。女性主义、同性恋理论和批判种族理论都指责专业社会学忽视了性别、性和种族压制的普遍性和深奥性。在每一种情况下, 批判社会学都企图使得专业社会学认识到自身的偏见、失声, 从而在其他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研究。批判社会学是专业社会学的良知, 正如公共社会学是政策社会学的良知一样。

批判社会学也为我们厘清四种社会学的关系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由阿尔弗雷德·麦克朗·李 (Alfred McLung Lee) 在他的主席致词中提出的, 即“社会学是为了谁” (Sociology for whom)。我们是否只与自己对话 (学术听众), 还是我们也在与他人 (非学术听众) 交流。提出这个问题也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因为很少有人会主张一个封闭的学科, 或者只是为了追求知识而追求知识。为非学术的听众参与做辩护, 无论是为客户服务还是与公众对话, 都不是否认与之相关的危险与风险的存在; 而只是说, 尽管这些危险和风险存在, 我们依然需要这样做。第二个问题是林德的问题: “社会学是为了什么” (Sociology for What)。我们是否应该关心社会的目标或者只关心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 这个区别正是韦伯关于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讨论的基础。韦伯, 以及其后的法兰克福学派关心的是技术理性正在取代价值的讨论, 也就是霍克海默 (Horkheimer) 谈到的理性的式微, 或者他与其合作者西奥多·阿多诺 (Theodor Adorno, 1969 [1944]) 称为的启蒙辩证法。我将一种知识称作工具性知识 (instrumental knowledge), 无论它是解决谜团的专业社会学还是解决问题的政策社会学。我将另一种知识称作反思性知

识 (reflective knowledge), 因为它关注的是关于目标的对话, 无论是发生在学术共同体内关于某项研究的基础的对话, 还是学术与各种公众之间关于社会发展方向的对话。反思性知识同时质疑了社会及我们所从事职业的价值前提。表 1 总结了这整个方案。^①

表 1 社会学的劳动分工

	学术听众	非学术听众
工具性知识	专业的	政策的
反思性知识	批判的	公共的

在实践中, 任何社会学的片断都可以横跨这些理想类型或者随着时间推移在它们之间穿越。比如我已经注意到, 公共社会学与政策社会学之间的区别往往很模糊——社会学在为客户服务的同时也能激发公共辩论。

范畴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学劳动的范畴化, 重新定义了我们认识自己的方式。我现在从事的是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1986 [1979], 1988 [1984]) 称作的分类斗争 (classification struggle)。通过把中心放在两个问题——“我们从事社会学是为了谁和为了什么”上, 我们取代了关于定量与定

^① 这个主题与帕森斯 (Parsons, 1961) 著名的四种功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四种功能分别是——调适、目标达成、整合与模式维持 (AGIL) ——任何一个系统都必须以它们为前提来生存。如果批判社会学与以价值为基础的模式维持功能相对应, 而公共社会学与整合相对应, 其影响是通过以交换为中介, 那么政策社会学就与目标达成相对应, 专业社会学以其经济信度与调适相对应。哈贝马斯 (Habermas, 1984: chap. 7) 给了帕森斯一个批判的转向, 将生活世界 (模式维持与整合) 看做是被系统 (调适与目标达成) 殖民化了。我们将看到论题七结合了哈贝马斯的殖民化理论与布迪厄 (Bourdieu, 1988 [1984]) 对学术界的田野分析。

性技术、实证主义与解释性方法论、微观与宏观社会学的辩论。余下的论题企图合法化与扩展这个分类系统。

论题四 内部复杂性的说明

“知识是为了谁” (knowledge for whom) 与“知识是为了什么” (knowledge for what) 的问题, 定义了我们学科的基本特征。它们不仅仅将社会学划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 也使我们理解了每一种类型是如何内在构建的。

我们知识的四种类型不仅代表社会学功能的差异, 而且也代表了四种看待社会学的不同视角。从批判社会学的立场来看社会学的劳动分工与从政策社会学的立场来看社会学的劳动分工是十分不同的。确实, 批判社会学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其与专业 (“主流”) 社会学的对立来定义自己的, 它视自身为与背弃政策社会学不可分割。政策社会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攻击批判社会学政治化了社会学, 从而败坏了我们的学科。因此, 从每一个范畴内部, 我们企图简化、同化和形塑其他范畴。因此, 我们必须尝试认识到所有四种社会学类型的复杂性。通过再次提出我们的两个基本问题——知识是为了谁以及知识是为了什么——来认识这种复杂性是最佳的方法。这导致了每一种社会学的内部分化, 因而呈现出一个更加细致的图景。我们同样也能看到每一种类型内部驱使其向某个方向发展的张力。

让我们从专业社会学开始。它的核心是多种研究的创造、详细阐述以及退化。但是专业社会学也有一个政策的维度, 来为在更加广阔世界中的社会学研究辩护——为政治竞争性研究的基金

辩护, 比如对性行为的研究; 对人类主体协议 (human subjects protocols) 决定性因素的研究; 还有争取政府支持的行为, 如族群奖学金项目等。专业社会学的政策维度在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办公室中体现得最为集中, 并且呈现于其实事通讯《脚注》的页面上。专业社会学也有一个公共的面向, 将其研究发现以一种可接近的方式展现在外行观众面前。这就是我们的新杂志——《语境》(Contexts) 所公开宣布的目标。但同样的功能也由美国社会学协会办公室组织的常委会简报完成。在这里, 我们同样看到了很多教师在传播他们的社会学研究发现, 当然, 还有社会学教科书的写作。在专业社会学的公共面向与公共社会学自身之间只有一条微弱的界线, 但是前者与维护我们核心专业活动的条件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

最后, 专业社会学也有批判的面向——研究项目内部与研究项目之间的辩论, 比如关于阶级与种族的相对重要性、全球化的影响、过度工作的模式、选举政治的阶级基础、低度发展的原因等等。这些批判性的辩论是《社会学年度评论》(Th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中文章的主题, 并且它们将必要的动力注入我们的研究项目。专业社会学的四种分类展现在表 2 中。

表 2 分解专业社会学

专业的	政策的
在研究项目之内做的研究, 这些研究项目定义假设、理论、概念、问题和谜团	维护社会学研究、人类主体、基金和国会简报
批判的	公共的
研究项目之内或之间的批判性学科争论	关注社会学的公共形象, 以一种可接近的方式呈现研究发现, 教授社会学的基础知识与写作教科书

由于专业社会学的规模，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功能分化，或者如阿伯特（Abbott, 2001）称作的，专业社会学的“碎片化”（fractalizaion）。但是其他类型的社会学内部则较少发展得如此充分，所以我们最好是谈论它们的不同面向或者维度。因此，公共社会学的核心活动——社会学家与他们的公众之间的对话——是（或不是）由专业的、批判的和政策的面向（moment）支持的。以波士顿学院的媒体研究与行动项目（Media Research and Action Project）为例，它将社会学家与社区的组织者集中到一起研究如何能最好地将社会议题呈现给媒体。对于这个项目，存在着以威廉·盖森（William Gamson）的理论框架为基础的专业面向，以媒体运作的有限方式为基础的批判面向，以及与社区组织者的具体目标相斗争的政策面向。夏洛特·莱恩（Charlotte Ryan, 2004）描述了项目内的张力，这种张力源自公共社会学的及时性与专业社会学的职业生涯节奏之间的矛盾需求；而盖森（Gamson, 2004）解释了高等院校为地方社区赋权之项目的经济条件限制。

政策社会学同样也有其专业的、批判的和公共的面向。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茱迪·斯德西（Judy Stacey, 2004）作为一个专家证人在加拿大的安大略湖维护同性婚姻的经历。同性婚姻的法律反对者以她发表于《美国社会学评论》（Stacey and Biblarz, 2001）中广为阅读的文章为基础。作者们认为，虽然研究表明，同性恋家庭对孩子的抚育效果中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即这些人对性的多样性更为开放——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影响在任何方面是“有害的”。同性婚姻的反对者认为，斯德西与比布拉兹的研究基础在科学上是如此薄弱以至于不应该由此产生任何结论。因此，茱迪斯·斯德西发现，她在为自己的结论的科学严

格性做辩护时是十分尴尬的。而且，她对同性恋的公民自由的辩护引起了婚姻的辩护——一个在她的学术写作中受到强烈批判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政策社会学有多大的局限性，而且它对专业社会学的依赖是如何使它与批判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对立的。任何一种社会学的四个面向与其他面向都可能不是和谐的。

我们在批判社会学中也能看到这种状况。在多罗西·史密斯（Dorothy Smith）的经典文章《女性的社会学》（*A Sociology for Woman*）中，她从男性的立场检验了社会学的普遍化，尤其是从掌握社会宏观结构的统治层男性立场。从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的经典著作出发，她阐述了植根于日常微观结构的女性立场——即女性作为支撑宏观结构的不可见劳动力。帕特丽夏·希尔·科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 1991）进一步发展了立场分析，她坚持认为，对社会的看法来自那些被多重压迫的人群——贫困的黑人女性——但是她自己也以传统的社会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她运用了乔治·齐美尔和罗伯特·默顿的理论来阐释对专业社会学的批判。并且，对她而言，也存在着一个公共的面向——黑人女性知识分子与贫困的黑人女性文化之间的关联，对于给专业社会学带来更大的普遍性是必要的。这样，我们看到了批判社会学的专业与公共面向，那它的政策面向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能否认为这里存在着为普遍性之内的批判思想的实力政治辩护的空间，这些空间可能包含跨学科的项目、机构以及为代表权所做的斗争？

这些只是用来证明每一种类型的社会学复杂性的例子，以帮助我们认识它们的学术与非学术维度，以及工具性与反思性维度。当我们再次关注这四种主要类型的关系时，我们不应该忽略它的内在复杂构成。

论题五 定位社会学家

一方面，我们必须对社会学与它的内部分工进行区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对社会学家与他们的道路进行区分。社会学家的生命是由他或她的社会学习性与整个学科领域的结构之间的不匹配推进的。

我们应该区别开社会学劳动的分工和占据其中一个或多个位置的社会学家。大约 30% 的博士是受雇于大学之外的，主要集中在政策研究领域，他们可以从这里走向公共领域（Kang, 2003）。在大学中任教的 70% 的博士占据了专业的领域，进行研究或者传播其研究成果。但他们也可能在其他领域占据职位，如果他们至少拥有任期路径职位的话。相比之下，临时工的大军——助手，临时的演讲人，兼职教师——被限制在一个地方，他们通常全心投入教学却只领着微薄的薪俸（一门课程 2000 ~ 4000 美元），他们的工作没有保障，并且往往也没有福利（Spalter-Roth and Erskine, 2004）。他们在高知名度的大学中更加普遍，他们构成了雇员的 40% 并教授 40% 的课程。这些廉价劳动力为永久教员补贴了研究与工资，使得他们能从事更多的活动。

因此，我们很多最著名的社会学家占据了多重位置。比如，科尔曼同时在专业和政策两个领域内工作，而对批判社会学与公共社会学持敌视态度。克利斯多佛·杰克斯（Christopher Jencks）虽然在相似的政策领域内工作，却不同寻常地将批判和公共面向与专业和政策事业结合起来。阿里·霍奇柴尔德

（Arlie Hochschild）的情感社会学在专业与批判社会学之间徘徊，而她关于工作与家庭的研究将公共社会学与政策社会学结合起来。当然，这些社会学家占据或者曾经占据了一流社会学系的舒适职位，拥有能够占据多重位置的工作条件。我们大多数人在一个时段只占据一个领域，所以我们也应该将注意力放在职业生涯上。

社会学家不仅同时处于不同的位置上，也随着时间推移在我们四种类型的社会学中选择不同的道路。在专业的职业生涯巩固之前，社会学家在各领域内的运动是十分不稳定的。越来越对学术不满并且在学术内由于其种族而被边缘化的杜波伊斯，在 1899 年完成了《费城黑人》（*The Philadelphia Negro*），并且于 1897 ~ 1910 年间在亚特兰大大学建立和运作亚特兰大社会学实验室（Atlanta Sociological Laboratory）之后，离开了学术界去创建了国家有色人种发展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并成为其杂志《危机》（*Crisis*）的编辑。在这个公共角色中，他写出了各种流行的散文，这些文章不可避免地受到其社会学的影响。1934 年，他返回学术界就任亚特兰大社会学系主任，并且在那里完成了他另一本经典专著——《黑人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不料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国家与国际公共事务再次离开。他为种族公平所做的不懈活动是公共社会学的顶点，虽然他的最终目标总是为了改变政策。公共社会学往往是政策领域内被边缘化的、被封锁在外的一条道路，并且也被学术界排斥。

当杜波伊斯选择了学术外的道路时，他的对手，种族社会学的另一个主要人物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则向着相反的方向

向发展。^① 在做了多年记者后，包括激进地揭露了在刚果发生的比利时暴行，他成为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的私人秘书和研究分析师，之后他又进入、塑造和专业化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Lyman, 1992）。

米尔斯是之后的一代，但是和杜波伊斯一样，他日益对学术界不满。当他在得克萨斯大学拿到了哲学的本科学位之后，他去了威斯康星与德国移民汉斯·格斯（Hans Gerth）一起工作。在那里，他写出了关于实用主义的博士论文。默顿和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将他招聘到哥伦比亚大学，因为他展现了作为一个专业社会学家的潜力。由于无法忍受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应用研究中心（Bureau of Applied Research）的“狭隘的实用性”，他从工具性社会学转向公共社会学——《权力新贵》（*New Men of Power*）、《白领》（*White Collar*）和《权力精英》（*Power Elite*）。在他短暂生命的最后阶段，在他充满灵感的《社会学想像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一书中，他重新回到了社会学的允诺与抱负上。这个向批判社会学的转向与社会学走向公共知识领域的转向相契合，如《听着，美国佬》（*Listen, Yankee*）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因》（*The Causes of World War Three*）——这些书与社会学只有微弱的联系。^②

今天社会学的职业生涯比米尔斯时代更加严格。一个典型的

① 感谢斯蒂文·斯坦博格（Stephen Steinberg）指出这个巧合。尽管帕克在专业化社会学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尽管他支持中立的社会科学，宣称对赫尔地区的女性行动社会学持反对态度，但他并没有放弃社会变革。

② “公共社会学家”与“公共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别是很重要的——前者是后者的一个专业种类，他们将公共评论限制在一个业已建立起来的专门领域，而不是阐述更具一般性的主题（Gans, 2002）。

研究生，可能被他的本科老师激励或者被一个社会运动激发——带着批判的性情走入研究生院，希望学习更多关于社会变迁的可能性，无论这是减少艾滋病在非洲的传播，还是减轻青少年暴力、土耳其和伊朗的女性主义运动成功的条件、作为道德源泉的家庭、死刑支持的变化、公众对伊斯兰教的误解，等等。在那里，他会面临一系列必修的课程，每一门课都有其需要掌握的深奥的文本或者抽象的技术。三四年后，他就可以参加三到四个领域的资格或预备考试，之后他将开始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这个过程需要至少五年时间。研究生院似乎是为了抹煞掉最初激起人们对社会学兴趣的道德义务而组织起来的。

正如涂而干强调契约的非契约因素——作为契约不可或缺的认同与信任基础——同样我们也必须重视职业生涯中非职业因素的重要性。熬到拿到博士学位的50%~70%研究生中的很多人，通过从旁从事公共社会学保持了他们最初的动机——这往往是背着他们的导师进行的。我总是听到一些教师建议他们的学生远离公共社会学，直到拿到终身教职——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得太清楚？）公共社会学是保持社会学激情蓬勃的事物。如果他们听从了他们导师的意见，他们可能会成为一个临时教员从而使从事公共社会学的时间更少，或者他们十分有幸能找到一个终身教职，这样他们就必须考虑在权威的期刊上发表文章或者在知名的大学出版社出版书籍。一旦他们得到了终身教职，他们就可以自由地沉浸于他们年轻时的激情，但那时他们已经并不年轻了。他们可能会对公共社会学丧失兴趣，倾向于在更加有利可图的政策领域做顾问，或者取得专业社会学的一个职位。最好是从一开始就沉浸于公共社会学之中，这样可以点燃专业社会学的火炬。

社会学劳动的分化与其产生的专业化可以造成对社会学惯习

的渴望：渴望反思性知识与工具性知识的结合，或者渴望一个需要学术与非学术听众的惯习。制度与关系之间的张力驱使社会学家不断从一个领域走向另一个领域，在那里，他们可以为仪式性的位置暂时稳定下来，或者放弃整个学科。尽管如此，总有人惯习对于专业化调适得很好，并且他们的精力和热情总是很有感染力，溢出到其他领域。我现在就要说明专业化与公共社会学并不是敌对的。

论题六 规范性模式与其病理学

我们学科的繁荣取决于一个共享的精神气质，它是专业社会学、政策社会学、公共社会学与批判社会学互惠共存的基础。然而，如果过于重视自身领域的听众，每一种类型的社会学都可能采取病态的形式，从而威胁到整个学科的活力。

那些支持公共社会学的人往往对专业社会学采取公开的蔑视态度。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 1987）的《最后的知识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引起了一系列评论，哀悼公共知识分子退隐到专业化的茧中。因此，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 2002）赞扬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是“最后一个社会学家”（*The Last Sociologist*），因为里斯曼以及他同代的其他人处理的是具有重大公共意义的问题，而今天的专业社会学只是模仿自然科学，检验狭隘的假设。通过提问“社会学发生了什么”（*Whatever Happened to Sociology?*），彼得·伯格（Peter Berger, 2002）回答说，这个领域已经成为方法论

拜物教的牺牲品和对琐碎主题的迷恋。但是他也抱怨 20 世纪 60 年代的人们将社会学从一门科学转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他描绘了很多专业社会学家对公共社会学的冷漠接受，后者害怕公共参与会腐蚀科学，会威胁到学科的合法性以及它能够调动的物质资源。

我持相反的观点——在专业社会学与公共社会学之间应该有，而且通常确实存在尊重与配合。它们不仅不是不相容，而且是像孪生双胞胎那样。的确，我对社会学学科的规范性看法，是我们的四种类型存在着互惠共存的关系——一种有机的结合，每一种类型的社会学从它与其他类型的关系中得到活力、意义和想像力。

正如我已经坚持的，我们学科的中心是它的专业部分。没有专业社会学，就不会有政策或公共社会学，也不会有批判社会学——因为那将没有可以批判的对象。同样，专业社会学的活力也取决于以公共社会学为媒介的不断的公共事务的挑战。正是公民权利运动改变了社会学家对政治的理解，也正是女权主义运动给社会学如此多的领域指出了新的方向。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参与到运动中的社会学家给社会学注入了新的思想。同样，琳达·维特（Linda Waite, 2000）对婚姻的公开辩护在我们的专业中产生了活跃的辩论。批判社会学对于专业社会学而言可能是眼中钉，但是强迫我们对自己做出的假设有清醒的认识也是十分重要的，这样我们才能不断修改那些假设。古尔德纳（Goulder, 1970）对结构功能主义，以及对政策社会学可能成为压迫性社会控制的无意识载体之方式的挑战是如此大胆与爽快。今天我们可以在批判社会学的门类中加入“纯社会学”运动（movement for “pure sociology”），即一个没有公共参与的科学社会学。专业

社会学的昨天可能成为批判社会学的今天。政策社会学，从它自身而言，已经通过对贫困和教育的研究重新激活了关于不平等的社会学。近期，医学研究与所有四种社会学联姻，通过与诸如患有乳癌的公民群体合作建立起了新的科学参与方式（Brown et al., 2004; McCormick et al., forthcoming）。

这种相互配合的例子很多，但是我们应该谨防认为我们学科的融合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四种社会学之间的联系往往很难达成，因为它们在很多不同的维度上有着十分不同的认知实践，在相当多的维度上存在差别，比如知识形式、真理、合法性、可说明性，还有政治，而且在它们各自特有的病理学上达到极致。表3列出了这些不同。

表3 对社会学知识类型的详细阐述

	学术的	非学术的
工具性的	专业社会学	政策社会学
知识	理论的/经验的	具体的
真理	一致性	实用的
合法性	科学的规范	有效性
可说明性	同行	客户
政治	专业性自利	政策干预
病理学	自我指涉性	屈从性
反思性的	批判社会学	公共社会学
知识	基础性的	沟通性的
真理	规范性的	认同
合法性	道德视角	相关性
可说明性	批判的知识分子	指定的公众
政治	内部辩论	公共对话
病理学	教条主义	时尚性

与专业社会学相联系的知识是基于研究项目的发展之上的，它与政策客户要求的具体知识以及社会学家与他们的公众之间交流的沟通性知识不同，从而与批判社会学的基础性知识也不同。从这里产生了每一种社会学拥护的真理的概念。专业社会学关注的是生产与经验世界一致的理论，政策社会学的知识必须是“现实的”或者“有用的”，公共社会学的知识是基于社会学家与他们公众之间的一致认同，而对批判社会学而言，没有规范性的基础来引导的真理什么都不是。每一种类型的社会学都有自身的合法性。专业社会学以科学规范为基础来合法化自己，政策社会学以其有效性为基础来合法化自己，公共社会学以相关性为基础来合法化自己，而批判社会学必须提供道德的视角。每一种类型的社会学也有其自身的可说明性。专业社会学对同行的评论是可说明的，政策社会学对其客户、公共社会学对一个指定的公众，而批判社会学对一个能够超越学科边界的批判知识分子的共同体是可说明的。进一步说，每一种类型的社会学都有其自身的政治。专业社会学维护科学的条件，政策社会学提出政策干预，公共社会学将政治理解为民主的对话，而批判社会学致力于在我们学科内部展开辩论。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每一种社会学都要忍受自己的病理学，后者是从其认知实践和对不同的机构的嵌入中产生的。如果只对一个狭窄的学术圈说话，那么就很容易退回到一种隔绝的岛国状态。专业社会学在解决那些由我们的研究计划定义的问题时，就很容易变得只对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感兴趣。^① 当我

① 我之所说“看似”无关紧要，首先也最重要的是因为每个人的研究计划定义了什么是反常的和矛盾的现象。如果得到的研究结果看上去价值不高，那么研究计划本身肯定得承担没有眼光和缺乏相关性的批评。

们努力捍卫我们在科学世界中的一席之地时，我们往往倾向于垄断那些不易接近的知识，而这样则会导致晦涩的宏大理论或者狭隘的“方法论主义”。不仅是专业社会学，批判社会学也有天生的宗派主义的不好倾向——成为一个墨守教条的共同体，而不再与专业社会学提供任何合作或者为公共社会学注入任何价值。另一方面，政策社会学也很容易被客户左右，他们为自己的资助添加了很多强制性的附属条件，因此造成的扭曲甚至会反过来影响到专业社会学的研究。如果市场研究已经如米尔斯当年曾经担忧过的那样控制了对政策社会学的资助，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被胁迫。社会学家向商学院、教育和政策学院的流动可能缓和了这一病症，但肯定无法将这个学科与这些压力完全绝缘。公共社会学也不比政策社会学好多少，它同样可能被外部力量胁迫。在追求普及性的同时，公共社会学往往会为了迎合和取悦大众而牺牲掉专业的和批判的承诺。当然了，公共社会学还存在着另一种危险，就是以居高临下的口吻对公众说话，一些知识分子先驱可能就曾如此。事实上，我们或许能从米尔斯对“大众社会”的轻视中发现这一点。

这些病症都是确实存在的趋势，因此雅各比、帕特森、伯格等人对专业社会学的批判并不是无本之木。但这些批评家的错误在于，他们将病态的当成了常规的。他们轻巧地忽略掉专业社会学重要的、关系重大的研究，比如在《语境》中我们能够看到的，同时他们也没有看到自己那种社会学的缺陷。那些专业社会学家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轻蔑地称公共社会学为“通俗社会学”，而忽视了无处不在生机勃勃而往往又不那么轻易就能理解的公共社会学。作为一个共同体，我们却轻易就互相干起仗来，而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分歧的知识是需要相互

依赖的。我们大家需要扛起一面共同的旗帜，使专业的、政策的、公共的和批判的社会学能够相互理解。这样的话，我们也要容纳病理学的不断发展。制度化、互惠的相互交流也要求我们发展出一个共同的精神气质，以实现所有这四种类型的社会学的有效性——依据我们所研究问题的紧迫性的承诺。在这样一个最好的状态中，从这样一个规范性的视角出发，我们不必一定要成为一个公共社会学家才能为公共社会学作贡献，我们也可以通过成为一个优秀的专业、批判或政策社会学家来贡献于公共社会学。每一种社会学的繁荣都将促进所有社会学的繁荣。

论题七 社会学作为一个权力场域

在现实世界中，学科是权力的场域，其中相互依存变成相互对抗。结果造成了，至少在美国，工具性知识压倒了反思性知识而居于支配地位。

社会学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兴盛过一阵子，但是在80年代却又被一场暴风雨给打回原形。当时，社会学处在危机之中——本科生入学率直线下降，社会学家的工作环境也不断恶化，出现了很多社会学系要关闭的传言；从学术上看，这个学科也似乎失去了方向。欧文·路易斯·霍诺维茨（Irving Louis Horowitz, 1993）的《社会学的崩溃》（*The Decomposition of Sociology*）抱怨社会学的政治化。詹姆斯·科尔曼注意到政治正确的危险以及社会规范对学术界的人侵。斯蒂芬·科尔（Stephen Cole, 2001）主编的《社会学怎么了？》（*What's Wrong*

with Sociology?) 收集了一些杰出的社会学家包括彼特·伯格、琼·休伯 (Joan Huber)、兰德尔·柯林斯 (Randall Collins)、马丁·李普赛特、詹姆斯·戴维斯 (James Davis)、梅伊·扎尔德 (Mayer Zald)、阿瑟·斯廷施凯姆 (Arthur Stinchcombe)、霍华德·贝克尔 (Howard Becker) 等人, 他们哀悼社会学的碎片化、不一致, 不能够像一门真正的科学那样可以积累——在这里, 主要是与自然科学或经济学相对比, 后两者总是统一的、一致的和可积累的! 他们这种 20 世纪 50 年代的乐观主义被 60 和 70 年代对共识社会学的重大挑战打破。现在, 胆小鬼都回家歇着了, 而社会学, 在他们眼中, 正面临着危机。

也许能够代表此种类型写作的最有趣和最彻底的著作就是斯蒂芬·特纳和乔纳森·特纳 (Stephen Turner and Jonathan Turner, 1990) 的《不可能的科学》(The Impossible Science), 这本书从一个黯淡的立场上重建了社会学的历史。他们宣称, 社会学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稳定的受众群, 也没有可靠的赞助者和庇护人。它不断被政治力量干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因为科学主义占上风而被中断过一阵。如果说在这些关于衰败的叙述中有一个共同线索的话, 那就是将社会学的“不适”(malaise) 归因于其反思性知识中蕴含的颠覆性力量, 不管是以批判社会学还是公共社会学的形式。

我认为, 社会学不仅是一门劳动分工尚未被整合的学科, 也是一个权力场域, 一门各种相互竞争的知识或多或少以一种固定的等级秩序展现的学科。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同意那些“衰退论者”的说法。但是, 我不能同意他们对于社会学现状以及社会学内部权力平衡的判断。社会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衰退仅仅是一个短期现象, 今天的社会学早已克服了萧条, 进入一个前所

未有的好时光。社会学专业的学士数量从 1985 年来稳定增长, 超过了经济学和历史学, 几乎要赶上政治科学。社会学博士的数量虽然要落后于这些相邻学科, 但是绝对数量从 1989 年以来也一直在增长。可以预测的是, 这些数字还要增长下去, 以满足本科生教学的需要, 尽管从事临时或辅助性的工作是总的趋势, 且没有改变的迹象。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会员数目在过去四年里也增长迅速, 回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的最高值。相对于一个不利于社会学的政治气候来说, 这可能显得有些奇怪, 当然也可能恰恰是这样的气候使人们被社会学的批判性和公共价值吸引。

我第二个不能赞同“衰退论者”之处, 在于他们对社会学所受威胁的看法。我相信, 是社会学的反思性维度而不是工具性维度处在危险之中。至少在美国, 专业社会学和政策社会学——前者提供职位后者提供资金——支配着整个学科的取向。提供价值的批判社会学和提供影响的公共社会学则与职位和金钱的力量无法匹敌。可能会有人对表 1 的纵向维度提出争议, 但真正阻碍这四种社会学共生与合作的则是在水平维度, 它制造出来的是专业社会学和政策社会学的统治联盟以及批判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在底层的相濡以沫。这种支配模式源于这个学科嵌入于一个更加宽泛的权力和利益格局之中。在我们这个社会, 金钱和权力远远比价值和影响有力量得多。在美国, 资本主义尤其压制公共领域; 后者不仅弱小, 而且被大量的专家和过剩的媒体占据。社会学的声音很轻易就被湮没了。就如同公共社会学需要面对一个竞争激烈的公共空间, 批判社会学也需要面对学科的“割据化”, 结果是, 批判的对话从它最重要的动力来源中被抽离出来——也就是其他学科中类似的批评论述。

权力的天平似乎倾向于工具性知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将我们的学科变成我们自己的，创造一个能够生产出更加勇敢和更有生机的思想的空间来。当然，专业社会学对同行负有责任，公共社会学对公众负有责任，但这必然就会导致敌对的阵营么？一定要相互诟病么？同样的，尽管批判社会学和政策社会学并不一致，一个坚持自身的自主性，另一个则为自己的客户负责，但是如果双方都能够承认对方的一部分，共生就可以取代对抗。与其将社会学陷入分裂状况，我们或许可以发展出某种相互协作的多样化以及富有成效的结合。

在这里，我无法更进一步地讨论这个权力场域内部潜在的对抗与联盟。但我们有理由说，如果社会学能够被一种支配体系统合起来的话，那么让这种体系是一个霸权体系要好于是一个专制体系。霸权体系意味着，处于从属地位的知识（批判的和公共的）能够获得发展它们自身力量的空间，并且能够反哺支配性知识。专业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也应该为批判的和公共的社会学的繁荣奉献自己的力量。不管短期内如何分裂，长远来看，工具性知识离开了反思性知识的挑战也不能够繁荣。因为，从更为广阔的社会中得到的和不断被检讨的价值，巩固了其研究的基础，而价值是需要不断更新和重置的。

我们已经勾勒了这个权力场域的轮廓，在这里面包含了这四种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尽管是以一个相对而言有些抽象的方式。它们之间真实的联系将随着院系、时间、国家甚至全球结构变迁的不同而不同。相应地，剩下三个议题将通过一系列比较的方式来探讨当代美国社会学的特殊之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加深对那些形塑社会学的国内和全球力量的理解。

论题八 历史和等级制

专业社会学在美国的支配地位是从与公共、政策和批判的社会学的持续对话中得来的。但即使在美国，专业社会学的力量也集中在高度分化的大学教育体系的一些顶尖研究院系，而公共社会学则往往在大学体系的底层扮演着比能够看到的要更为重要的角色。

今天我们已经将专业社会学的统治地位视为美国社会学的一个规范性特征，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较为近期的现象。我们可以根据专业社会学地位的逐渐加强，将美国社会学的历史划分为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

专业社会学开始于19世纪中期，最初是作为改良派、慈善团体和改革团体为一方与另一方的早期社会学家之间的对话。后一方往往具有宗教背景，但他们将自己的道德信仰寄托在羽翼未丰的世俗科学——社会学之上。美国内战后，对社会问题的研究通过收集和分析劳动力数据以及对贫困的社会调查而发展起来。借助收集数据来展示下层阶级的困境变成一场运动，在它身上已经奠定了专业社会学的基石。在这样一个初萌的公民社会中，社会学家与各种形式的团体保持紧密联系，即使在1905年美国社会学学会成立以后也是如此。从源头上讲，社会学内在的就是公共的。

第二阶段则见证了社会学的承诺从公众到基金会和政府的转向。从20世纪2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社会和宗教研究中心（后来这个机构资助了著名的中镇研究）以及支持芝加哥大学和北卡罗莱纳大学的社区研究开始，基金会就逐渐在推动社会学研

究中扮演一个越来越积极的角色。同时，农村社会学也想方设法在国家内部创造一个研究基地（Larson and Zimmerman, 2003）。威廉·奥格本（William Ogburn）作为总统研究委员会的主席，推动出版了规模巨大的《美国近期社会趋势》（*Recent Social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资助的社会学研究继续开展，最著名的要数萨缪尔·斯托佛（Samuel Stouffer, 1949）关于美国军队士气的多卷本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新的资金来源出现了，即财团法人对调查研究的资助，以拉扎斯菲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应用社会研究中心为代表。社会学越依赖于商业和政府资助，它就越发展出一套严格的分析经验数据的统计方法，这也招致了很多方面的批评。

美国社会学的第三阶段，以批判社会学卷入专业社会学为标志。最初的灵感来自罗伯特·林德（Lynd, 1939）对社会学的画地为牢和价值中立的批判。其后最有名的继承者也许就是赖特·米尔斯（Mills, 1959）了。他将社会学在第一阶段对公众的承诺称为“自由主义的实用性”，而将第二阶段对财团和国家资金的承诺称为“狭隘的实用性”。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是在为第三阶段的“批判社会学”的登场开辟道路，而后者将同时改变这个领域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两方面的取向和趋势。埃尔文·古尔德纳（Gouldner, 1970）为第三阶段奠定了里程碑，他攻击结构功能主义的基础以及这一派的社会学家，并且为新的受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理论趋势开辟了空间。这一批判社会学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专业社会学的重建在背后提供了能量和想像力。

下一个推动社会学的力量将来自哪里？论题一宣称，社会学气质和现实世界之间的鸿沟将推动社会学进入公共舞台。并且，

专业社会学如今已经足够成熟和自信到去回归其公民的根源，和从一个优势地位上来推动公共社会学——这是对理解我们时代的那些深刻而烦扰的全球趋势的承诺。如果19世纪初萌的公共社会学还不可避免地带有地方性的话，它毕竟还是为20世纪雄心勃勃的专业社会学打下了基础；而后者，又将反过来为它自身的卓越创造基础——那就是21世纪的全球向度的公共社会学。

这并不是说要忽视地方性的公共社会学的重要性，后者恰恰是社会学家和他们直接所处的社区之间的有机纽带。而且，毕竟全球进程也只能通过以及由地方的进程来构成和表现自己。我们必须认识到，已经有如此之多的地方性的公共社会学正发生在我们现有的教育体系里，在这个体系中，教员们肩负了沉重的教学负担。如果他们能够挤出一点点教学之外的时间，他们就将他们的公共社会学带到了课堂之外、社区之中。我们不了解这些正规课程之外的公共社会学，因为这些实践者没有时间把它们写下来。幸运的是，凯利斯·特兰德、萨姆·马若罗，尼可·卡特福斯、兰迪·斯多克还有帕特里克·多诺修（Strand, Kerry, Sam Marullo, Nick Cutforth, Kandy Stoecker, Patrick Donohue, 2003）等人为我们揭开了这个隐秘的领域，他们编辑了一本关于有机公共社会学或者他们所谓的“立足社区的研究”的手册。这本书展示了一组原则和实践，也包括大量的实例，其中很多将研究、教学和服务结合起来。

更加宏观地看，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是一套乱七八糟的机构的结合，其中存在着显著的等级制和巨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四种社会学的形态在不同的层级和不同的地方就显得各不相同。研究和专业人员在大学体系上层的集中，是通过，或者说至少部分是通过我们的教学机构，包括四年制和两年制学院的不堪重负来

实现的。社会学在这些机构的分配就如同在世界上资源匮乏的其他地方一样。在下一个议题，我将揭示美国内部的多样性，这也反映了在全球水平上的多样性。

论题九 美国社会学的本土化

美国社会学看似是一个普通的，实际上却是特殊的——不仅在于它的内容，也包括形式，即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四种社会学。同时，美国社会学又对其他国家的社会学有着很大的影响，这对后者并不一定都有好处。因此，我们不仅要改造社会学的国内劳动分工，也要改造其国际劳动分工。

“公共社会学”是一个美国式的术语。如果说在别的国家，这是社会学的精髓所在的话，那么对我们来说，它可能仅仅是这门学科的一部分，并且是很小的一部分。实际上，对于某些美国社会学家来说，它可能甚至都不属于社会学。当我去南非宣讲公共社会学时，很多听众都困惑地望着我。在他们看来，除了参与多种多样的公共生活和公共议题之外，社会学还能是什么呢？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也可能存在。但是在美国，美国社会学协会将我们这次年会的主题定为“公共社会学”，其实就已经说明了专业社会学在美国的力量有多么强大。此外，在一个国家的专业社会学可能都弱于公共社会学的世界中，专注于后者也意味着对美国社会学国际霸权的挑战，并且直指美国社会学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的重建。

四种社会学的型构随着国家的不同而不同。在南半球，如

我刚才所说的，往往有着一个非常强大的公共社会学的存在。我1990年访问南非时，惊讶于那里的社会学和反种族隔离斗争之间的紧密联系，尤其是劳工运动，当然也包括各种公民组织。在美国，我们是在理论上研究社会运动，而在南非，社会学家却是在从事社会运动！这样一项事业促使南非的社会学产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社会运动的工团主义（social movement unionism）——美国社会学在20年之后才发现了这个领域，还把它当作一个全新的想法。并且，南非社会学不仅仅关注社会动员，也关注社会动员的目标。社会学家分析了种族隔离国家的特征和趋势，争论反种族隔离斗争的策略。他们讨论自己是应该作为这场运动的服务者还是批评者。如今，在南非的种族隔离被废除10年之后，公共社会学面临的处境却并不乐观，社会学家纷纷进入非政府组织、公司或是国家机器；新政府要求他们从公民社会的阵线中撤离出来，专心从事教学；社会研究也转向直接的政策议题并追求所谓的“国际化”，比如拿美国的专业社会学作为标准（Sitas, 1997; Webster, 2004）。

类似的趋势在别的国家也存在，不过各有其特点。以苏联为例，社会学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转入地下，重新露面时是作为对后斯大林政体之下一个官方或非官方的批判的武器。在20世纪60年代的解冻时期，民意调查成了公共社会学的一种形式，但很快被苏共垄断。在塔提亚娜·查斯拉夫斯卡亚（Tatyana Zaslavskaya）的强力领导下，改革使社会学家大规模地走出学院。社会学开始与公民社会的发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在后苏联时代，随着公民社会的“空心化”，羽翼未丰的社会学在抵抗市场力量的入侵时显得软弱无力。除了极少数例外，社会学被放逐到商学院和民意、市场调查中心。在那里，社会学成了一个

重要的学术事业，往往是由西方基金赞助，雇用的是在英国或者美国受过训练的社会学家。

斯堪的纳维亚的情况又非常不同，因为这些国家拥有非常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这里的社会学伴随着福利国家成长起来，既带有很强的政策导向，却又有着同样强烈的公共意含。挪威社会学虽然受到美国社会学的深刻影响，但也适合于政策世界，且女权主义在这里的影响非常大。挪威总共不到 500 万人口，其中注册的社会学家不超过 200 个；这个学术社群很小，反而更刺激了其在广阔的社会中寻找一席之地的抱负——无论是在政府，还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社会学家经常为报纸、电台和电视写稿。挪威还积极地将他们的公共社会学带到国外，它已经成为一个连接美国、欧洲和南半球各国的国际枢纽。

欧洲的其他国家则各不相同。法国拥有非常久的专业社会学传统，同时又培育了一个传统的公共社会学，其中包括雷蒙·阿隆、皮埃尔·布迪厄和阿尔·图海纳等领军人物。英国的专业社会学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发展起来的，非常之新；在撒切尔时代，又通过束缚公共和批判社会学而形成了一个防御性的内向性格。工党政府重新执政使社会学又获得了生机，扩大了政策研究的范围，也将其最杰出和多产的公共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送进了上议院。

在勾勒各个国家的社会学时，我们不仅看到美国的社会学是如此不同，也看到了美国社会学的强大影响力。每年制造 600 个社会学博士，美国社会学如同一个巨人大步走在世界社会学的版图上。许多在其他国家任教的第一流社会学家，都是在美国受到的训练。美国社会学协会拥有 14000 名会员和 24 个全职工作人员。不仅仅是数字和资源上的支配地位，现在各国政府都在要求

它们的学术界，包括社会学，向“国际”水平看齐，这意味着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这不仅发生在南非和中国台湾，也发生在那些拥有相当多资源的国家，比如说挪威。为了向西方看齐以及用英语发表文章，各国的社会学丢掉了它们对于本国问题和地方性议题的关注。在各国内部，全球化的压力加剧了社会学的劳动分工，使四种社会学的裂痕越来越大。

由于在其实践者一方缺乏共谋或者说深思熟虑，美国社会学取得了世界性的霸权。因此，我们肩负特别的责任使我们自己的社会学本土化，将它从普适的神座上请下来，实现其独一无二的品质和国家性的力量。我们必须与其他国家的社会学展开对话，理解它们的地方性传统或它们本土化社会学的抱负。我们必须从全球视角出发，来认识正在出现的社会学的国际分工。如果美国社会学凭借专业社会学主宰世界，那么我们也需要鼓励南半球的公共社会学和欧洲的政策社会学。我们需要鼓励批判社会学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要超越学科还要超越国家的界限。我们应该将我们的社会学应用于我们自身，对操纵我们学科的全球性力量保持更加清醒的意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控制它们，而不是被它们牵着鼻子走。

论题十 区分各个学科

社会科学与人文和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们既与工具性知识又和反思性知识相结合——这种结合本身就是变化的，因此也给公共和政策干预以不同的机会。跨学科的知识在四种社会学的每一个里都采取了不同形式。

有人说，学科分工是19世纪欧洲历史的武断产物，我们现在的学科专门化不过是一个历史的错误，因此我们应该向一个统一的社会科学迈进。这种实证主义者的幻想最近又在沃勒斯坦主编的古本根委员会关于重建社会科学的报告（1996）中被旧事重提。这个想法看上去没什么坏处，但它却忽略了以下问题——知识为了谁？知识为了什么？——新的统一的社会科学太容易就会消解掉自反性，而这恰恰是社会科学的批判和公共的品质。在一个充满宰制的世界里，统一很容易就变成是有权势者的统一。仅仅因为它们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形成的，就做出学科分工是武断的这一断言，本身就忽视了它们形成中的和不断改变着的意义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利益。这实际上是犯了基因谬误（genetic fallacy）。为了勾勒学科分工的基础，同时也因时间所限，我将示意性地描述一下各个学科领域，在我的陈述中，不可避免地会忽略掉学科内部的分化以及随着时空而产生的变化。

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以工具性知识为基础，扎根于研究项目，它的发展是由科学共同体支配的。学术之外的阅听人来自政策领域——工业或政府部门，他们需要利用科学发现为其服务。逐渐地，他们还直接进入学术领域指导或者监督自然科学研究，以防止医学、核物理和生物工程等领域的共谋关系（Epstein, 1996; Moore, 1996; Schurman and Munro, 2004）。常常会延伸到公共辩论中的批判的反思性，并不是自然科学的本质，而是人文科学的。艺术或文学作品的价值，最终是要在狭窄的评论界的对话基础上，或者在更加宽泛的公众中得到判定的。它们的真理是通过其审美价值（依据推论性的评估）建立起来的，这一点与批判的和公共的知识相似；但是，当然了，它们也可能被精心包装成工具性知识，甚至进入政策领域。

社会科学则走在人文和自然科学之间，因为社会科学既包括工具性知识，也存在反思性知识。在各种社会科学中，这两种类型知识之间的平衡并不一样。举个例子，经济学，是一门范式性科学，由一个主导的研究范式所支配（新古典经济学）。这一特点在学科组织上的表现就是：非常稀少的荣誉（克拉克奖章或者诺贝尔奖）、主要期刊的精英控制、对各个经济学系甚至是各个经济学家的清楚排名，以及组织上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的缺席。异议经济学家只有当他们首先能够在专业上确立自己地位时才能生存下来。事实上，我们或许可以将专业经济学比作共产党对其异议者的规训和其试图传遍世界的内在一致的信条，所有这一切，都以自由为名。^① 经济学内部的一致性给了它在学术领域中很大的声望，同时也对政策领域造成很大的影响。

如果说经济学像共产党，那么美国社会学则更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分权的参与式民主。它建立在多样的和重叠的研究传统之上，表现在：它有43个活跃的部门以及不断增长的各种奖项（Ennis, 1992），以及超过200种社会学期刊（Turner and Turner, 1990: 159）。我们运作的制度化模式反映了我们多样的视角——尽管不总是那么充分。社会学，尽管也是一个等级制的和精英世袭的体系（Burris, 2004），但它毕竟比经济学开放得多，从系所之间的教员流动以及研究生选拔的方式上就可以看出（Han, 2003）。这个学科在选举其学会的官员时也更加民主。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会员决议不仅仅局限于专业，只要获得3%的会

^① 马里恩（Marion Fourcade-Gourinchas, 2004）的著作揭示了美国经济学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从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1999）的观点出发，埃文斯（Evans, 2004）勇敢地试图推动经济学走向有机的公共承诺，成为一门敏感于地方性议题和协商性民主的经济学。

员支持就可以参加选举。因此，如果说经济学在政策领域更加有影响力的话，那么社会学的学科结构则是以一种对应多样的公众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公共领域，我们更倾向于通过我们的公共参与间接地影响政策。

再看看别的社会科学。政治科学处于“割据”状态，但它更倾向于政策而非公众，倾向于工具性而非反思性知识。如今，迈向理性选择模型的趋势已经在政治科学中导致了一个反思性取向的回应。政治科学的改革运动（The Perestroika Movement）支持以更制度化的方法研究政治，并主张政治理论应该是批判理论。人类学和地理学则都在工具性—反思性的分野之间呈割据状态，因此，文化人类学和人文地理学往往反对同行们的科学模型，而与人文科学相通。哲学，另一门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摇摆的学科，则在批判性知识中找到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学科分工在美国要远比其他地方显著，因此，“交叉学科”的知识在我们各个学科的边缘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存在。四种社会学的每一种都与相邻学科发展出自己的交换和合作关系。在专业化知识的分界面上，存在着一种跨学科的借鉴。当经济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从相邻学科借鉴一些东西时，它们仍然属于社会学的一个独特部分——市场和政治的社会根基。在批判性知识的分界面上，则存在着一种跨学科的输出。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和批判种族理论，都在批判社会学对专业社会学的参与中留下了印记。但是这种输入通常是被限制的。公共性知识的进展则通常来自多学科合作，比如，“共享行为研究”将各个学科的学术社群联合起来。每个学术社群确定一个研究议题——公共住房、环境污染、疾病、最低生活工资、教育等等——然后再通过一个跨学科的团队来框构和最终形成研究路径。最后，在政策领域存在着

所谓的“各学科联合协调”的方式，这通常反映了学科之间的不同等级。因此，国家资助的区域研究通常为了对某一明确的政策目标服务，这也就给了政治科学和经济学以优先的地位。

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学科分工及其与工具性和反思性知识之间的不同结合，那现在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种不同意味着什么？特别是，社会学知识及其代表的利益有没有什么独一无二之处？我们可以既是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同时又偶然地成了社会学家么——一个无足轻重的事件，一件个人生活的意外？我们在社会科学中有没有自己的认同？这些问题将我带入最后一个议题。

论题十一 社会学家作为党人（PARTISAN）^①

如果说经济学的立场是市场及其扩张，政治科学的立场是国家和维护政治稳定，那么社会学的立场就是公民社会和保卫社会性（the social）。在市场暴政和国家专制的年代，社会学——特别是其公共面向——捍卫着人类的利益。

社会科学不是一个学科的大熔炉，因为各门学科代表了不同的和相反的利益——首先也最重要的利益就是维护这些学科的知

^① 标题来自埃尔文·古尔德纳的同名文章。与本论题相关的还有皮埃尔·布迪厄的挑战性论述：“民族社会学家是人类的一种有机知识分子，作为集体行动者，它们通过致力于提供一种植根于对特殊主义理解基础之上的普遍主义的知识，可以促成破除有关人类存在的自然论和宿命论。”转引自华康德（Wacquant, 2004）。

识所赖以立足的基础。经济学，如同我们今天知道的，依赖市场的存在，其利益就在于市场的扩张；政治科学，取决于国家，其利益在于政治稳定；而社会学则依赖公民社会，其利益在于社会性的扩张。

但是，什么是公民社会呢？为了论述方便，我在这里将其定义为19世纪晚期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物，这一时期出现了在国家和经济之外的结社、运动和公共领域——包括政党、工会、学校教育、信仰团体、印刷媒体和各种志愿组织。这种结社性的生活正是社会学独一无二的立场，所以一旦它消失了——斯大林的苏联、希特勒的德国、皮诺切特的智利——社会学也就消失了。当公民社会繁荣之时——比如改革的俄罗斯或者南非种族隔离的末期——社会学也繁荣起来。

社会学与社会之间存在着类似脐带般的联系，但是，这肯定不是说社会学只研究公民社会。远远不只如此。它是从公民社会的立场上研究国家和经济。以政治社会学为例，它与政治学并不一样。它研究政治的社会前提以及社会正义的政治化，就如同经济社会学也与经济学不一样，实际上它关心的是经济学家忽视的东西，即市场的社会基础。

这种社会科学的三分法——我在这里没有空间将地理、历史和人类学等相邻学科包括进去——在19世纪它们诞生时是确实的，但是到了20世纪就变得模糊了（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边界的消融和重叠）。但是，过去30年来，这种三分法随着国家单边主义（state unilateralism）和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的出现正经历着复苏。这一时期，公民社会被市场和国家的殖民化和征用。尽管如此，对这两股力量的对抗也随之而来，且这种对抗一定是来自公民社会，通过其地方的、国家

的和跨国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与公民社会的从属关系，表现在公共社会学，是公共社会学代表了人类的利益——抵抗国家专制和市场暴政。

下面让我具体阐述一下我刚才所说的。首先，我确信经济学和政治科学，在它们之间，已经生产出将不受约束的市场和国家正当化的意识形态时间炸弹，这种不受约束正在摧毁公共大学的基础，而这也是它们自己学科存在的条件，就如同其他学科一样。但是，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想要否定所有的政治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各个学科，归根到底都是权力的场域，每一个都有自己支配性的和对抗性的力量。想一想政治科学中的改革运动或是“反对闭门造车的经济学运动”（Post-Autistic Economics）——一种将个体视为成熟的和多重面向的人的经济学。我们社会学家可以并且事实上也已经从这些对抗性的知识中找到自己的同盟军并与它们合作。

社会学自身也是分裂的。毕竟，公民社会不是什么和谐的地方自治主义，而是被种族隔离、统治和剥削分裂。^①历史地看，公民社会是男性的和白人的。随着它逐渐变得更加包容，国家和社会也随之入侵进来，反映在社会学中就是对一些如社会资本这样的概念的不加批判的使用。公民社会绝对是一个竞争性的场域，但我还是要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它也是捍卫人性的最有可能的场域——而培育一个批判导向的公共社会学将为这种捍卫提供帮助。

^① 在这里，我与涂尔干视角部分一致，如埃特兹奥尼（Amitai Etzioni, 1993）和塞尔泽尼克（Philip Selznick, 2002），他们关注个体对社会的道德关系以及将等级制、支配和排斥等看做是不恰当的干预。因为没有以社会的分工为核心，他们也因此忽略了社会学内部的分工以及广义上的学术内部的分工。

我们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就像我在论题七里已经提到的，社会学劳动的制度化分工以及相应的权力场域到目前为止都在制约着公共社会学的壮大。我们没有必要去捍卫公共社会学，如果没有什么阻挡它实现的障碍的话。要超越这些障碍就需要不断地承担义务和做出牺牲。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成了社会学家——不是去赚钱而是去为实现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努力。这样说来，早就存在不少公共社会学了。但是也有新的进展。《语境》杂志在引导公共社会学方面迈出了很大一步。美国社会学协会也做出了很多努力，比如通过其会议简报和常规的出版发行物，以及通讯杂志《脚注》的专栏等等形式来普及和宣传公共社会学。本年度美国社会学协会还设立了一项旨在表彰媒体对社会学的报道的新奖项。我们需要在社会学和新闻业之间发展一个合作关系，因为记者不仅自身就代表着公众的一部分，同时也与我们以及其他公众站在一边。

美国社会学协会还建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来推动公共社会学的制度化，它主要将考虑三个关键议题。第一，它将考虑如何辨别和确认已经存在的公共社会学，使不可见的变得可见，使私有的变成公共的。第二，它将考虑如何建立对公共社会学的激励机制，以奖励在现有的考核和晋升体系中往往不占什么分量的公共社会学方面的努力。现在已经有一些社会学系设立了奖项和博客，并开始设计公共社会学的课程大纲。第三，如果我们要承认和奖励公共社会学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发展一个辨别好的还是坏的公共社会学的标准出来。我们还必须明确由谁来评估公共社会学。我们必须鼓励那些最好的公共社会学，不管它们是怎样的。公共社会学不能成为次等社会学。

尽管这些制度化的变迁非常重要，但是公共社会学的成功并

不会来自上面，而是从下开始。当公共社会学赢得了社会学家的想像力，当社会学家视公共社会学本身是重要的且有着自身的价值所在，当社会学家将它当作一场超越学术的社会运动来从事的时候，公共社会学的胜利就真正来临了。我期待社会学家与他们的大众之间的协作能够聚沙成塔，聚小流成江河，最后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潮流。他们将吸收一个世纪的广阔的研究、精深的理论、实际的干预和批判的思考，最后达到超越了各种界限（至少但绝不仅仅是国家的边界）的共同理解，通过这种方式从褊狭僵化的旧状态中摆脱出来。我们历史的天使也将会展开她的翅膀，在暴风雨之上自由翱翔。

参考文献

- Abbott, Andrew. 2001. *Chaos of Discipline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2004. *An Invitation to Public Sociolog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 Arendt, Hannah. 195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llah, Robert, Richard Madsen, William M. Sullivan, Ann Swidler, and Steven Tipton. 1985.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enjamin, Walter. 1968.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annah Arend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Berger, Peter. 2002. "Whatever Happened to Sociology." *First Things* 126: 27-29.
- Bielby, William. 2003. *Betty Dukes, et al. v. Wal-Mart Stores, Inc.*
- Blau, Peter and Otis Dudley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 Structure. New York: John Wiley.
- Bok, Derek. 2003. *Universities in the Marketpla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86 [1979].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New Yor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 1988 [1984]. *Homo Academicu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own, Phil, Stephen Zavestoski, Sabrina McCormick, Brian Mayer, Rachel Morello-Frosch, and Rebecca Gasio Altman. 2004.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26: 50 - 80.
- Burris, Val. 2004. "The Academic Caste System: Prestige Hierarchies in PhD Exchange Network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9: 239 - 264.
- Cole, Stephen (ed.) 2001. *What's Wrong with Sociolog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Coleman, James. 1966.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 . 1975. *Trends in School Segregation, 1968 ~ 1973*.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 . 1991. "A Quiet Threat to Academic Freedom." *National Review* 43: 28 - 34
- . 1992. "The Power of Social Norms." *Duke Dialogue* 3.
- Collins, Patricia Hill. 1991. *Black Feminist Thought*. New York: Routledge.
- Columbia Accident Investigation Board. 2003. *Report*. Vol. I.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Dewey, John. 1927.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New York: Henry Holt.
- Du Bois, W. E. B. 1903.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New York: A. C. McClurg.
- Ehrenreich, Barbara. 2002. *Nickel and Dimed*. New York: Henry Holt.
- Ennis, James. 1992.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ociological Knowledge: Modeling the Intersection of Special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259 - 65.
- Epstein, Steven. 1996. *Impure Scienc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tzioni, Amitai. 1993. *The Spirit of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Evans, Peter. 2004. "Development as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Pitfalls of Monocropping and the Potentials of Deliberatio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8: 30 - 53.
- Fourcade-Gourinchas, Marion. 2004. "The Construction of a Global Profession: The Case of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Fraser, Nancy. 1997. *Justice Interruptus*. New York: Routledge.
- Gamson, William. 2004. "Life on the Interface." *Social Problems* 51: 106 - 10.
- Gans, Herbert. 2002. "More of Us Should Become Public Sociologists." *Footnotes* (July/August) 30: 10.
- Goodwin, Jeff and Jim Jasper (eds.) 2004. *Rethinking Social Movement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Gouldner, Alvin. 1968. "The Sociologist as Partisan: Sociology and the Welfare State." *American Sociologist* 3: 103 - 16.
- . 1970.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 Habermas, Jürgen.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wo Volumes). Boston, MA: Beacon.
- . 1991 [1962].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Han, Shin-Kap. 2003. "Tribal Regimes in Academ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rket Structure Across Disciplines." *Social Networks* 25: 251 - 80.
- Horkheimer, Max. 1974 [1947]. *Eclipse of Reason*. New York: Seabury Press.
- Horkheimer, Max and Theodor Adorno. 1969 [1944].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Seabury Press.
- Horowitz, Irving Louis. 1993. *The Decomposition of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acoby, Russell. 1987. *The Last Intellectuals: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 New York: Noonday Press.
- Kang, Kelly. 2003. *Characteristics of Doctoral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in the*

- United States: 2001. Arlington, VA: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Division of Science Resources Statistics.
- Kirp, David. 2003. *Shakespeare, Einstein, and the Bottom Lin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akatos, Imre. 1978.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rson, Olaf and Julie Zimmerman. 2003. *Sociology in Government: The Galpin-Taylor Years in the U. 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1919 ~ 1953*. University Park,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Lee, Alfred McClung. 1976. "Sociology for Who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1: 925 - 36.
- Lippmann, Walter. 1922.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 Lipset, Seymour Martin and Neil J. Smelser. 1961. *Sociology: The Progress of a Decad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Lyman, Stanford. 1992. *Militarism, Imperialism, and Racial Accommodation: A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Early Writings of Robert E. Park*. Fayetteville, AK: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 Lynd, Robert. 1939. *Knowledge for What? The Place of Social Sciences in American Cul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arullo, Sam and Bob Edwards (eds.) "Service-Learning Pedagogy as Universities' Response to Troubled Times." Special issue of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3: 741 - 912
- McCormick, Sabrina, Julia Brody, Phil Brown, and Ruth Polk. Forthcoming. "Public Involvement in Breast Cancer Research: An Analysis and Model for Futur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 Merton, Robert. 1949.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Glencoe, IL: Free Press.
- Mills, C. Wright.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ore, Kelly. 1996. "Organizing Integrity: American Science and the Creation of Public Interest Organizations, 1955 - 1975."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1592 - 1627.
- Mueller, John. 1973. *War, Presidents and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Myrdal, Gunnar. 1944.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Ostrow, James, Garry Hesser, and Sandra Enos (eds.) 1999. *Cultivating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Service-Learning in Sociolog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 Pager, Devah. 2002. *The Mark of a Criminal Record*.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WI.
- Park, Robert. 1972 [1904]. *The Crowd and the Public*.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arsons, Talcott. 1937.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McGraw Hill.
- . 1951.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 . 1961. "An Outline of the Social System." Pp. 30 - 79 in *Theories of Society* edited by Talcott Parsons, Edward Shils, Kaspar Naeyegele, and Jesse Pitts. New York: Free Press.
- Patterson, Orlando. 2002. "The Last Sociologist."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9th.
- President's Research Committee on Search Trends. 1933. *Recent Social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cGraw-Hill.
- Purser, Gretchen, Any Schalet, and Ofer Sharone. 2004. *Berkeley's Betrayal: Wages and Working Conditions at Cal*.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ugust 16, San Francisco, CA.
- Putnam, Robert. 2001.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Rhoades, Lawrence. 1981.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1905 - 1980*. Washington, DC: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 Riesman, David. 1950. *The Lonely Crowd: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yan, Charlotte. 2004. "Can We Be Compañeros." *Social Problems* 51: 110 - 13.

- Schurman, Rachel and William Munro. 2004. "Intellectuals, Ideology, and Social Networks: The Process of Grievance Construction in the Anti-Genetic Engineering Movement."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IL.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Selznick, Philip. 2002. *The Communitarian Persuas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Sen, Amartya.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Random House.
- Sennett, Richard. 1977. *The Fall of Public Man*. New York: W. W. Norton.
- Sitas, Ari. 1997. "The Waning of Sociology in South Africa." *Society in Transition* 28: 12 - 9.
- Skocpol, Theda. 2003. *Diminished Democracy: From Membership to Management in American Civic Life*.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Smith, Dorothy. 1987.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Boston, MA: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Spalter-Roth, Roberta and William Erskine. 2004. *Academic Relations: The Use of Supplementary Facult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 Stacey, Judith. 2004. "Marital Suitors Court Social Science Spin-Sters: The Unwittingly Conservative Effects of Public Sociology." *Social Problems* 51: 131 - 45
- Stacey, Judith and Timothy Biblarz. 2001. "(How) Does the Sexual Orientation of Parents Matt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6: 159 - 83.
- Stouffer, Samuel et al. 1949. *The American Soldi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trand, Kerry, Sam Marullo, Nick Cutforth, Randy Stoecker, and Patrick Donohue. 2003. *Community-Based Research and Higher Education*.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 Turner, Stephen and Jonathan Turner. 1990. *The Impossible Science: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American Sociology*. London and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 Uggen, Christopher and Jeffrey Manza. 2002. "Democratic Contraction?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Felon Disenfranchis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 777 - 803.
- Vaughan, Diane. 2004. "Public Sociologist by Accident." *Social Problems* 51: 115 - 18.
- Waite, Linda and Maggie Gallagher. 2000. *The Case for Marriage*. New York: Doubleday.
- Wallerstein, Immanuel, Calestous Juma, Evelyn Fox Keller, Jurgen Kocka, Dominique Lecourt, V. Y. Mudkimbe, Kinhide Miushakoji, Ilya Prigogine, Peter J. Taylor, and Michel-Rolph Trouillot. 1996.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Report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cquant, Loïc. 2004. "Following Bourdieu into the Field." *Ethnography* 5 (4).
- Warner, Michael. 2002. *Publics and Counterpublics*. New York: Zone Books.
- Webster, Edward. 2004. "Sociology in South Africa: It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ociety in Transition* 35: 27 - 41.
- Wilson, William Julius. 1996. *When Work Disappears*. New York: Knopf.
- Wolfe, Alan. 1989. *Whose Keeper?*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